

胡适

文化观研究

马艳玲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胡适

文化观研究

马艳玲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文化观研究 / 马艳玲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201-3942-7

I. ①胡… II. ①马… III. ①胡适(1891-1962) -
文化思想-研究 IV. ①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5034 号

胡适文化观研究

著 者 / 马艳玲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杨春花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19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3942-7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该书为“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号: 15ZXD04)

目 录

绪 论	1
一 从民族危机到文化自觉——中国的“文艺复兴” ...	1
二 胡适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15
三 本书的逻辑结构	21
 第一章 从乾嘉朴学到实验主义	
——科学主义的文化进化观	25
第一节 乾嘉汉学的学术底蕴	28
第二节 实验主义的学术滋养	32
一 杜威的实验主义	33
二 科学的方法	34
第三节 进化论与存疑主义	37
本章小结	42
 第二章 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	
——理性主义的文化启蒙观	43
第一节 中国的文艺复兴——文学革命	44
一 文学改良论	45

二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49
三	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	55
第二节	思想领域的除魅——整理国故	59
一	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	60
二	整理国故的宗旨	65
三	整理国故的工具	69
四	整理国故的方法与步骤	72
五	整理国故的内容	75
本章小结		86

第三章 从国民性改造到科玄论战

——自然主义的科学宗教观	88
第一节 国民性改造——健全的个人主义诉求	91
一 对国民性病源批判与分析	91
二 个人主义	94
三 易卜生主义	100
四 小我与大我——社会不朽论	104
第二节 科玄论战——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108
一 论战的缘起与爆发	108
二 论战的展开与深入：科学作为意识形态	120
本章小结	127

第四章 问题与主义之间

——渐进主义的文化改良观	130
第一节 政治的导言：“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132
一 “问题与主义”论争的背景	132

二	“问题与主义”论争的过程及内容	136
第二节	问题与主义论争的方式——输入学理	154
一	新思潮的精神	154
二	输入学理的方法	155
第三节	政治的文本：“问题与主义”的解决	163
一	改良政治的《争自由的宣言》	163
二	好政府主义	167
三	政治的工具主义	168
四	民治政府的政治观	173
本章小结		179

第五章 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间

——世界主义的文化选择观	181
第一节 论战序幕：广州文化论战	184
一 批判复古派	187
二 批判折衷派	188
三 主张全盘西化	190
第二节 中国本位文化论争	194
一 胡适早期的西化观	195
二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203
三 胡适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209
四 十教授的政治总答复	212
第三节 胡适与全盘西化的文化观	216
一 胡适全盘西化观的根据	217
二 “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从“西化”到 “现代化”	220

本章小结	226
第六章 民主与独裁之间	
——民主主义的文化理想观	228
第一节 民主主义文化危机	230
一 国家干预主义的滥觞	230
二 民主与独裁论争的国难背景	232
第二节 民主与独裁论战的过程与内容	234
一 专制建国与民主建国	235
二 新式独裁与民主政治	242
三 武力统一与政治统一	248
四 国家建设与无为政治	254
第三节 中国民主文化的历史可能	262
一 民主文化的哲学基础	263
二 民主文化的制度基础	264
本章小结	265
结 语	267
一 胡适科学主义的文化进化观	269
二 胡适理性主义的文化启蒙观	270
三 胡适自然主义的科学宗教观	271
四 胡适渐进主义的文化改良观	272
五 胡适世界主义的文化选择观	273
六 胡适民主主义的文化理想观	273
参考文献	277

绪 论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人类历史重要时刻，总是会出现一些历史人物，这些人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成为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在一定意义上讲，胡适无疑就是足以标榜时代精神的人选之一。在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中，胡适已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人物之一。胡适研究正在渐渐成为一门聚讼纷争的论学，并且日益呈现出多边参与的国际化特点，多学科参与的综合化特点。

一 从民族危机到文化自觉——中国的“文艺复兴”

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胡适的思想是特定时代下的历史产物。胡适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严峻的历史时代，按照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说法，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直到今天总的说来处在一个大的转型期，为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历史的第二次社会大转型、文化大转型时期。早在 19 世纪，恩格斯就曾对晚清帝国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作了高瞻远瞩的预测性

判断，他认为1857年英国军队对北京城的“示威行动如果成功，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华帝国本身的存在，就会加速清王朝的倾覆”。^① 恩格斯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旧中国的灭亡是并不久远的事了，他说，过不了多久，我们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②

胡适所处的局势就是这样——一个旧有社会秩序、文化秩序濒临崩溃，新的社会秩序、文化秩序渐次构建的时期，可以说是处于亚洲新纪元的前夜。具体说来，前者是指两个崩溃：“一个是传统政治秩序的瓦解；一个是传统中国缺乏有生命力的思想与社会资源来反抗或整合（integrate）西方文明的冲击。”^③ 实质上讲，自康乾盛世末期即乾隆末年初始，清王朝就无可挽回地陷入了帝国余晖的危机之中。内忧来自国家机器的腐败，人口激增，土地集中的加深及由此导致的农民起义的蜂起等危机；外患则来自列强的侵略，既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独立自主的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安逸祥和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宣告与预示着古老的中国将经历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

政治危机的到来促使学者们感受到文化危机的严峻。此时，用以支撑“文化繁荣”局面的汉学走向没落，“兹学萃萃诸大端为前人发挥略尽。后起者率因袭补苴，无复创作精神，即有发明，亦皆末节”。^④ 这对于当时文化局面来说真可谓雪上加霜了。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7，第59页。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7，第60页。

③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第265页。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人民出版社，2008，第6页。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呈现在国人面前，展现的是一幅文化多元、思潮迭起、观念碰撞、风云激荡的局面，一时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阶层的人们基于不同感受、不同立场、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回应，演绎出中国近代所特有的历史背景下的东西方文化思想接触、碰撞、互动的发展历程。对此，张锡勤先生将中国近代化进程划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与此相对应的有几种社会思潮：地主阶级革新思潮、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潮、洋务思潮、资产阶级新思潮、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潮。^①

历史的车轮进入 20 世纪，中国依然没有摆脱内忧外患、贫穷落后的局面。武昌起义与辛亥革命的胜利，导致两千年来的封建帝制的灭亡，带来的是更加混乱不堪的民国政局，无论是洪宪窃国，还是张勋复辟，直至军阀之间的连年混战，致使国将不国。在如此严峻的现实情况下，中国的知识阶层开始进行更为深入的文化反思，虽然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未能完成，却促使民主思想的进一步传播，而科学在改变国民性方面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得到国人的广泛认同。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中就向国人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② 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

这次新文化运动无异于一次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其

①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第 3~4 页。

②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 年第 1 卷第 1 号。

使命就在于以新的文化范式拯救民族危机，这种新的文化范式发轫于新文化运动，以新的世界图式代替旧的世界图式，以新的文化范式代替旧的文化范式，以新的价值观念代替旧的价值观念，以新人代替旧人。它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文化史上近代的转型，即文化的革新、文化的转型，这其中的线索是古今之辩、中西之争、新旧之论，传统与近代之间、保守与激进之间、启蒙与救亡之间无不映射着其间选择、排斥、追求、融合的困苦历程。

（一）中国与西方之间：文化革新的历史背景

西方列强的入侵带来了社会及文化的巨大冲击，西方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中国要摆脱 1840 年以来任由西方列强宰割蹂躏、肆意欺凌的悲惨命运，就必须走向近代化，走向世界，建设近代化国家。而作为入侵者的西方世界无疑为中国近代化建设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是中国在近代世界的历史图景下进行近代化必须直面的生存现实，也是无可回避的当然前提。中国要从传统社会跨入近代社会，就应当也必须战胜和超越西方，甚至于首先就应该学习西方，这是严复等一代人所生存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一个严酷的历史现实。

由于中国的近代化开启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的近代化是在“遭遇西方”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西方列强的侵略因素在一定意义上讲贯穿了中国近代化的全过程，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西方因素”是无可回避的前提。因此，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革新与邻邦日本不同，后者是内源性的主动的近代化，而中国则是外源性的被动的近代化。另外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革新也与西欧不同，它是在中国固有之文化与欧洲

输入之文化相互接触、相互冲突的过程中觉醒的。在这一文化革新中，近代中国人既向近代“西学”寻求真理，同时也对自己的传统“中学”进行再认识、再评价。关于西方对于近代中国文化革新的重要意义，民国学者蒋廷黻先生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如以 19 世纪为界，之前尽管有如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族等外族入侵，他们仅仅是一时的统治，但是：

到了 19 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清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到了 19 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①

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是在特有的“中西”文化间对抗与接触过程中进行的：

中国近代的文化革新是逐步深入的。大致说来，在戊戌维新之前，改革者们主要是接受西方文化，并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方面作触动。而从戊戌维新开始，文化革新明显地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方面。^②

18 世纪的“康乾盛世”之后，标志着“传统社会”从此由盛转衰。19 世纪的鸦片战争，拉开了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序

①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第 2 页。

②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第 15 页。

幕，通过船坚炮利，西方向中国宣战，宣战不仅宣示着近代工业文明的殖民本性，也宣示着近代西方与传统东方之间的发展差距。当我们审视这段历史时，不得不承认中西方近代化进程的巨大差异。任何近代化包括西欧的近代化，都是与其传统有着直接联系和亲子继承关系。但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与“近代”，却成了毫无内在关联、截然对立的“土”与“洋”。所有“土”的东西均代表落后，均属于传统的古代；所有“洋”的东西均代表先进，均属于新的近代。传统就是落后，近代就是先进；中国就是落后，外国就是先进。近代化就是西化，西化就要向外国学习，无论是应对传统文化，还是应对西方文化，近代化都是唯一选择。无论是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其目的都是逐步地推动近代化。所以，近代化的文化革新的历史背景与逻辑前提无法脱离传统与西方的语境。

明朝末年，中西文化论争已然开启。徐光启最先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中西文化会通观，清梅文鼎提出了“见中西之会通，而补古今之缺略”的类似观点，以西补中，借西援中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文化革新之道。魏源超越徐光启等人的中西文化会通观，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改变了传统上的“华夷之辨”文化观，正式开启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文化学习之途。

“太平天国”称得上开启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次西化思潮，全面地抨击孔子与儒家经典，是对传统文化的第一次全面反省。戊戌维新派则走到了另一个方向，他们通过挽救儒学来进行传统文化的改造。在康有为看来，“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

他们主张以“援西入中”来保守儒家的传统文化，进而达到救亡图存目的。其间，康有为引入了西方的进化社会历史观；同时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注入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等思想。康有为的“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第二次西化思潮。

不同于洪秀全、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严复的思想代表了精英阶层的思想启蒙与文化反省。严复系统地向中国翻译介绍了西方近代的政治、社会思想和逻辑学知识，所谓“严译八大名著”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持续深远的影响。严复在中国传播“西学”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他引入了进化论，还在于他明确地将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定位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因此他是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与近代文化的启蒙者和传播者。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无疑来源于西方，但被孙中山巧妙地糅进了儒家的民本主义理念，成为中西会通的一种政治学说。“五权宪法”更是“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从而形成中西合璧的“五权宪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思想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第三次西化成果。

新文化运动无疑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为彻底的一次中西文化碰撞时期。它以“德先生”与“赛先生”为革新口号，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为目标，以思想论战、精神革新、文化斗争为方式，实现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第四次西化思潮。

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陈独秀等一班人意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政治，而在于文化。只有从根本上抛弃固有的传统文化，甚或民族精神，才可以彻底解决中

国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枝枝节节的改革是根本不能成功的。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认为文化而不是政治才是当前中国的核心问题。他指出，中国的出路不在少数人的政治运动，而在全体国民的觉悟；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国民民主自觉意识的基础上。为此，他大声疾呼：

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徜徉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①

通过中西文化比较，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深刻地指出，东西民族思想的根本差异，不能视为民族性的不同，而实质上是新旧观念的分野，或者说是现代生活与传统伦理精神的不同；评价文化的标准，不应看其国不国、古不古，而应视其粹不粹、是不是。他们断定，中国文化的出路，只能是以民主取代专制，以科学取代愚昧与迷信：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②

①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刊于《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② 陈独秀：《本质罪案之答辩书》，刊于《新青年》第6卷第1号。

在他们的号召之下，以西方近代文化为价值目标和参照系，反省和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新文化运动将新文化与旧文化对立起来，尽管有失偏颇，但它以极端而鲜明的反传统方式所建立起来的追求文化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则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的思想解放和人的现代化。

（二）激进与保守之间：文化革新的实践路径

中国文化在进入近代以来，随着社会政治风云的急剧变化，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历史变迁。从比较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源性的现代化，它不同于日本那种能动地迎接西方文明挑战的主动的内源性的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列强武力逼迫下的被动的现代化。在这种被动的、外源性的现代化进程中，中西文化冲突是必然的历史的社会反映。尽管传统文化曾遭受过多次的批判与冲击，但是其中对当今社会影响较大的一次批判和冲击当属 1915 年的新文化运动及受其影响的 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

面对激烈的历史变局与社会转型，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再次暴露出其致命弱点——无力应付世变；中国学者们再次面临其前辈在清初所承受的困扰——报国无术。本来，儒学是有体有用、有本有末的“内圣外王”之学，其内可修身自省，外可治国平天下。但已成疲软之势的理学自然早已丧失了“外王”功能，内圣的信条又为官僚士大夫们的腐败所践踏，成了空洞的说教。如何救亡图存，如何进行文化变革，如何应对中国近代化等问题，人们曾做过种种探索和尝试，为此进行